

## 纪念陈翰伯诞辰一百周年



# 自拟小传

陈翰伯

我祖籍江苏苏州，于1914年3月出生在天津。在天津上完小学、中学，在高中二年级“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并参加了一些天津党的外围工作。1932年我到北平，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1935年冬，在党的领导下，我和几个同学共同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1936年2月，我在燕大入党，后来在党内任北平学联党团书记之职。1936年夏毕业后到上海。在全国学联参加过短期筹备工作。1936年11月到西安，在东北军张学良将军所办《西京民报》任编辑，后任总编辑。1937年3月到杨虎城将军所办《西北文化日报》任副刊编辑、国际新闻编辑，并担任社论撰写工作。1937年5月，陪同美国记者、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前往延安约1个月。1939年春在成都《新民报》专管写社论工作。后在我党和民主各党派合办的《全民通讯社》主持发稿工作。1942年在重庆《时事新报》任新闻版编辑。1945年任重庆《新民晚报》副总编辑。1947年在上海，与几个同志创办党领导的公开发行的、群众性报纸《联合晚报》，我任总编辑。

全国解放以后，我在新华通讯社总社任编委，并兼国际新闻部主任，后来党把我从新华总社调到新闻总署，具体负责创办北京新闻学校，任副校长。1954年，新闻学校工作结束，我被调到中宣部，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具体工作是《学习》杂志责任编委。1958年春调商务印书馆，任总经理兼总编辑。十年动乱以后，我担任过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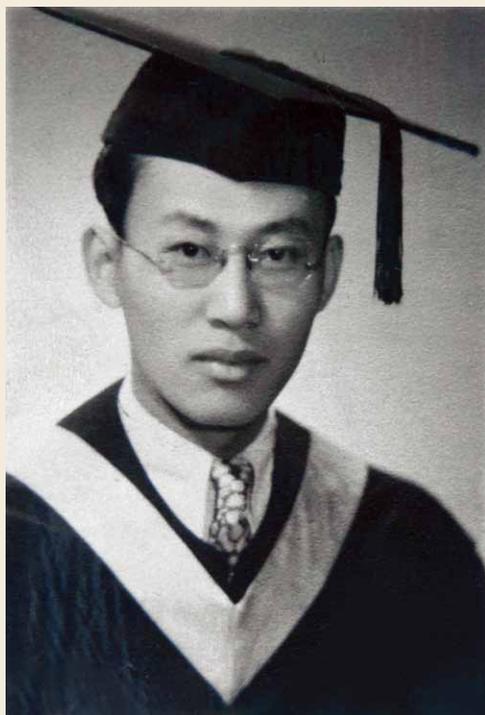
综上所述，我是青春办报，皓首出书，接触面虽较广，于学问上毫无专长，在事业上也无建树。聊以自慰的是，做了一枚对人民有点用处的螺丝钉。

1980年秋患病，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我已告老，但尚未还乡，现在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看看摊子。入党那年，我22岁，是一匹驹。而今垂垂老矣，但愿还能作一匹骥吧。

写于1985年6月5日



少年时与家人在苏州老家。（右2为陈翰伯）



1936 年，燕京大学毕业照。



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的陈翰伯。（下方中间戴礼帽者）



1954年，访问苏联。



1960年6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



1975年5月，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图为出席会议的主要领导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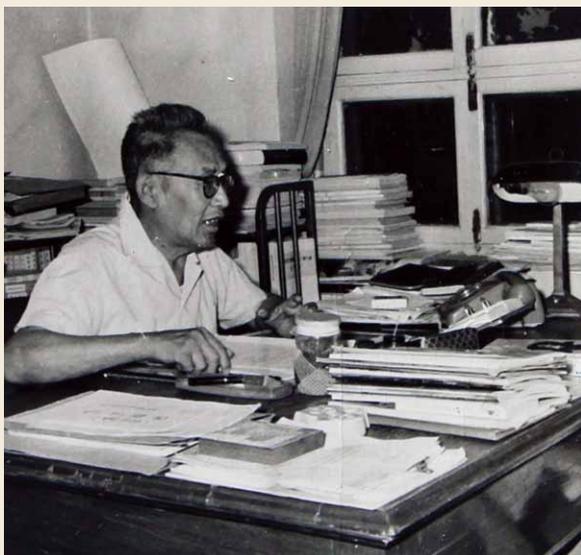
（左起：陈翰伯、徐光霄、陈原、许力以）



1975年5月，陈翰伯在广州召开的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期间，与领导及工作人员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合影。（左6为陈翰伯）



1976年1月15日至23日，在广州召开的《辞源》修订第一次协作会议。图为商务印书馆修订组与广东、广西、河南、湖南四省区全体代表参观毛泽东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时合影。（前排右5为陈翰伯）



1978年，在国家出版局办公室。



1978年秋，在安徽召开《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会议后，与部分工作人员到黄山游览，在黄山始信峰顶合影留念。（前排右2为陈翰伯）



1979年6月，在英国出版协会门前。



1979年6月30日，在马克思墓前。（前排左2为陈翰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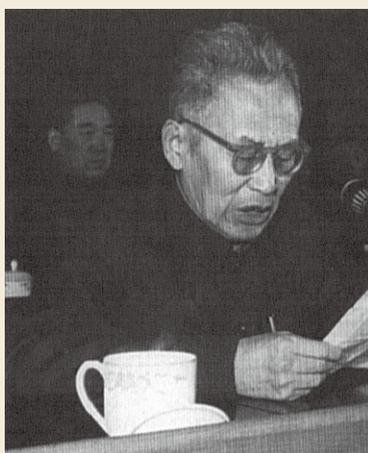
1979年9月，《汉语大词典》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苏州举行。作为《汉语大词典》编写领导小组组长（1986年3月起改称工作委员会主任）出席会议，会后与方厚枢在苏州北寺塔前合影。



1979年9月，与《汉语大词典》编委合影。（前排左5为陈翰伯）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和阿姆斯特朗，陈翰伯（前排左3）、姜椿芳（前排左1）等陪同。



1979年12月，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致开幕词。



1979年12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在湖南长沙市成立后，作为第一届理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王子野、许力以、陈原及部分理事在长沙岳麓山爱晚亭前合影。（前排左1为陈翰伯）



1980年，在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成立大会上讲话。



1980年5月28日至6月12日，中国出版代表团访问美国。作为代表团团长访问美国政府印刷局时向该局负责人萨姆·塞勒赠书。（左2为陈翰伯）



1981年，与胡愈之等出版界老同志合影。（前排左4为陈翰伯）



1981年4月，北京新闻学校第一期同学第一次毕业团聚。（前排左6为陈翰伯）



1981年12月15日，《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叶圣陶（右1）和大词典工委会主任陈翰伯（左2）、主编罗竹风（左1）在《汉语大词典》工作会议上。



1986年11月29日，陈翰伯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举行，张瑶均（左2）代表北京新闻学校第一期毕业同学，向陈翰伯（左3）献贺词。



1986年，与中宣部宣传干部训练班部分工作人员和学员合影。（前排右1为陈翰伯）



陈翰伯与于光远。



陈翰伯与姜椿芳。



陈翰伯与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



1961年初秋，和家人在北海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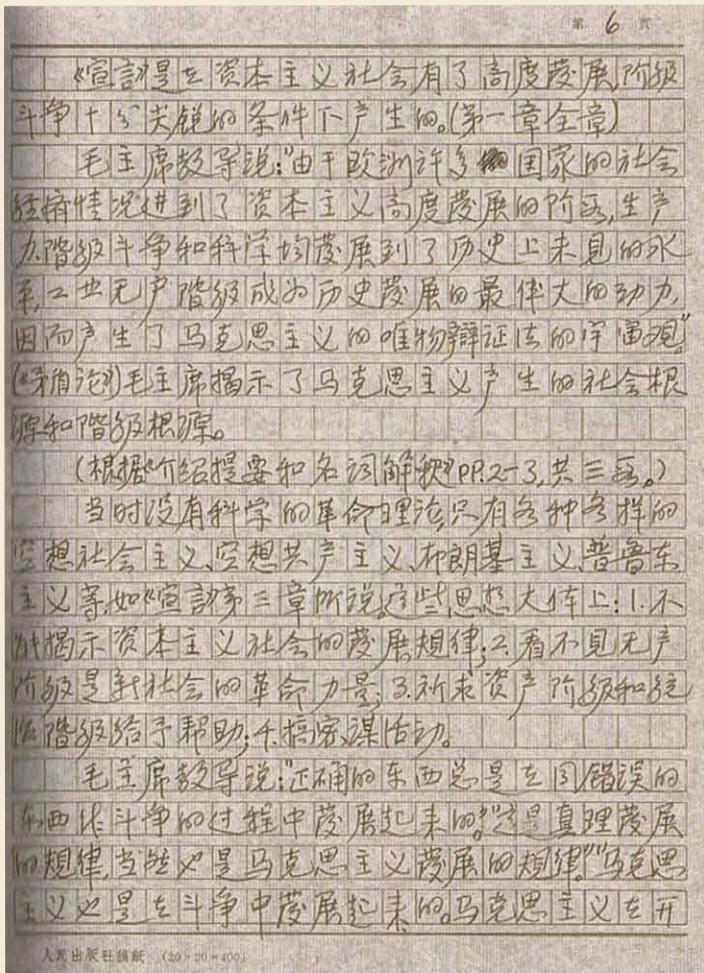


1975年，黄刺梅花开时节与家人合影。



陈翰伯 (1914-1988)

手 迹



1964年3月至1973年11月，陈翰伯先后在文化部干部学习班和“五·七”干校、人民出版社、国务院出版口、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等部门做过学习《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文献的辅导报告和学习时事问题的报告。这是做《共产党宣言》辅导报告时的讲稿手迹。

出差小记

一 1973年6-7月  
 广州 长沙 郑州  
 同行王东楼

二 1974年10月  
 上海 嘉定  
 同行方厚根 梁郁忠 曾先耀 张维垣  
 阮敬英 朱原 黄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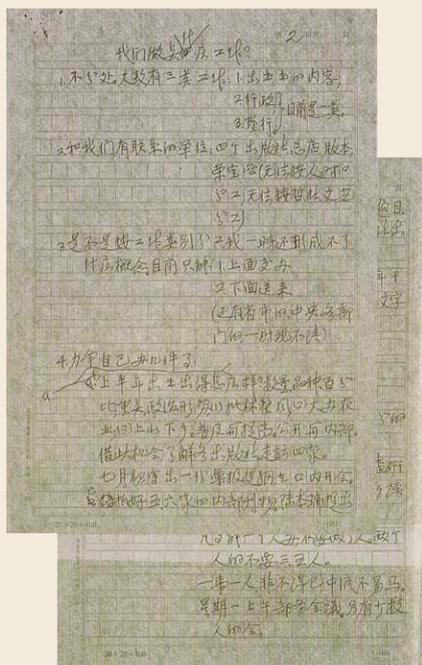
三 1975年5月  
 上海 金山  
 同行陈原 陆本瑞 杨德葵

四 1975年5-7月  
 广州  
 同上 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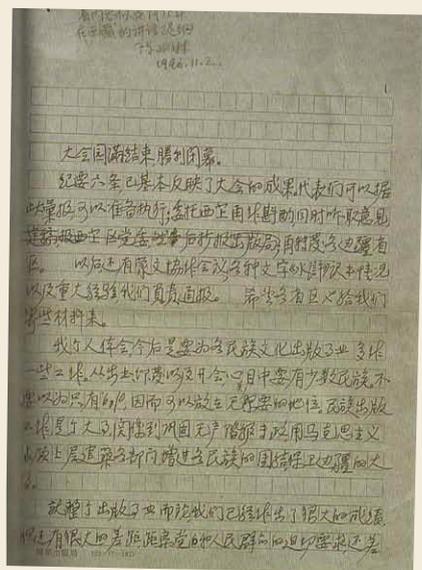
五 1978年11月  
 哈尔滨 大庆 牡丹江 吉林 虎林 珍宝  
 鞍山  
 同行张惠卿 张光路 金松林 智纯

国家出版局 (23·17·38)

1973年6月至1983年9月，陈翰伯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担任领导小组成员、代局长和《汉语大词典》领导小组组长期间，为了进行调查研究，召开或参加各种会议，先后到过29个省、市、自治区和66个地市、县（另外还到过香港和英国、美国）。这是他根据历年日记汇总的一份“出差小记”手迹首页。



1975年5月，陈翰伯由人民出版社调至出版口领导小组，分管出版发行部工作。这是他于5月28日了解该部情况时提出人员分工及业务工作安排意见的提纲手迹。



1975年10月，陈翰伯代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到西藏拉萨召开藏文图书出版协作会议。这是他在会议结束时所做报告的提纲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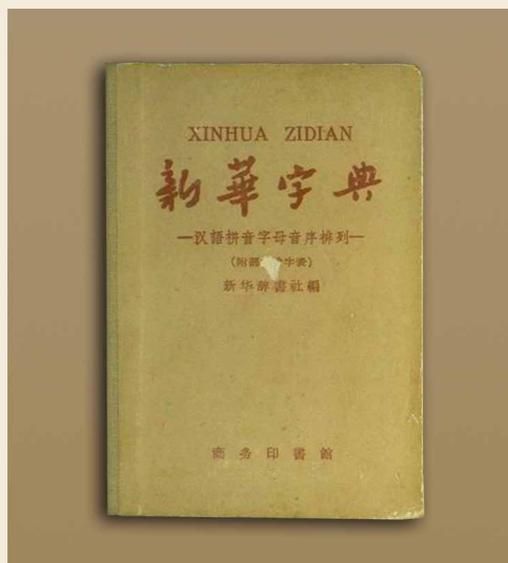
陈翰伯领导和主持的部分出版工程



1958年至1966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数百种外国学术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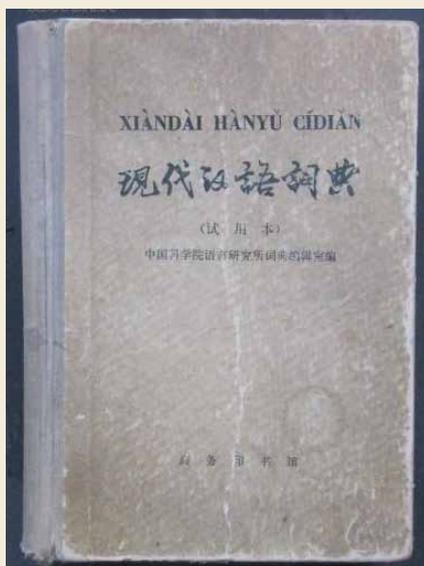
1961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外国历史小丛书》，吴晗、陈翰笙先后任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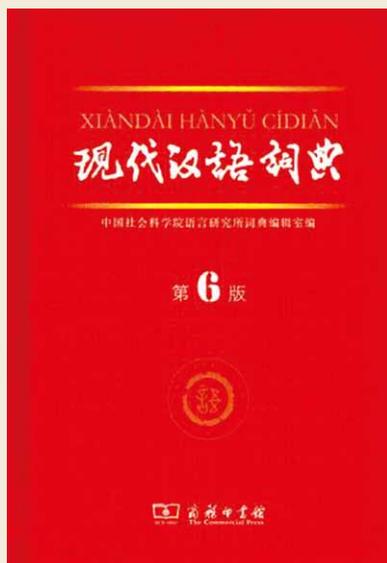
陈翰伯任职商务期间，大力支持《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新华字典》在 1975 年的中外语文词典十年 160 种出版规划中，被列为重点辞书。图为 1959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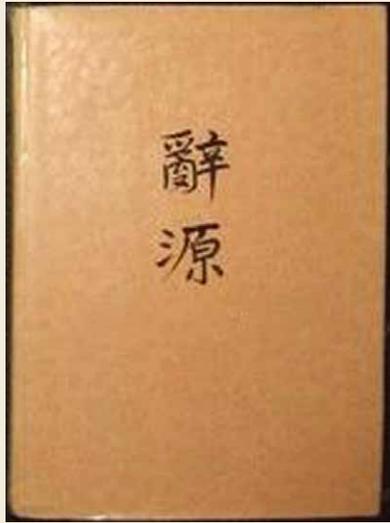
《新华字典》（第 11 版），2011 年，商务印书馆。



《现代汉语词典》的试编写工作在陈翰伯任职商务后展开，1960年印出“试印本”征求意见，1965年印出“试用本”送审稿，1973年内部发行，1978年正式发行第1版。图为1973年《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2012年，商务印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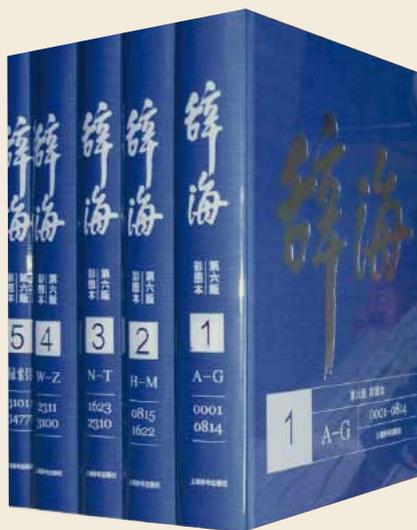
《辞源》于 1958 年开始修订，1979 年至 1983 年出齐四册。  
图为 1983 年版。



《辞源》修订本纪念版，2009 年，商务印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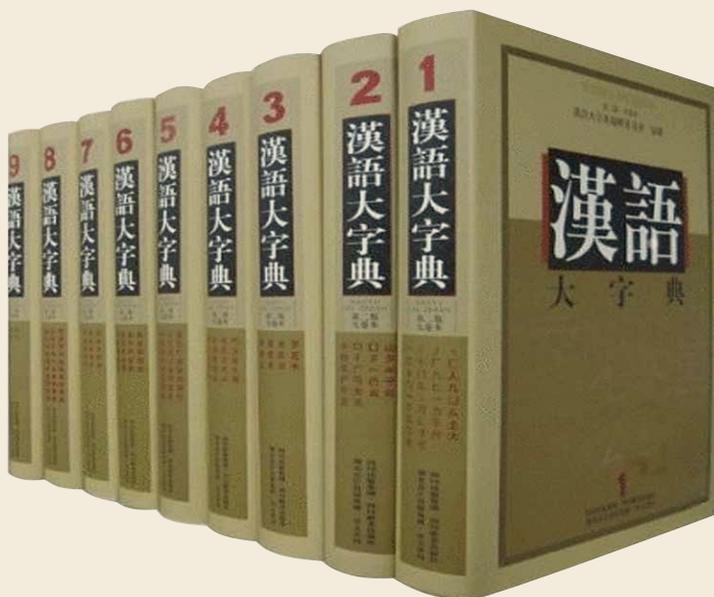
《辞海》，1975 年中外语文词典十年 160 种出版规划将其列为重点辞书，陈翰伯时任《辞海》编委会成员。图为 1979 年版。



《辞海》（第 6 版彩图本），2009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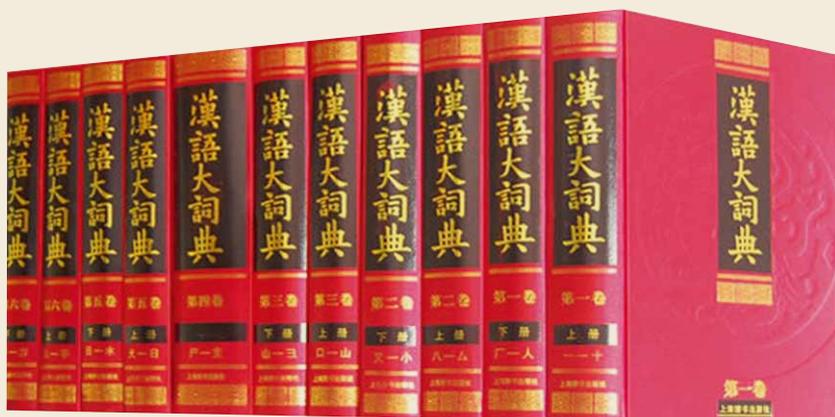
《汉语大字典》，共8卷。1975年中外语文词典十年160种出版规划将其列为重点辞书。图为1990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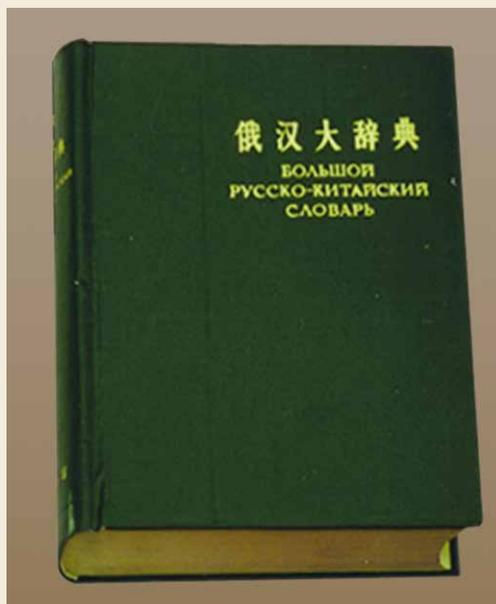
《汉语大字典》（第2版·精装），共9册。2010年，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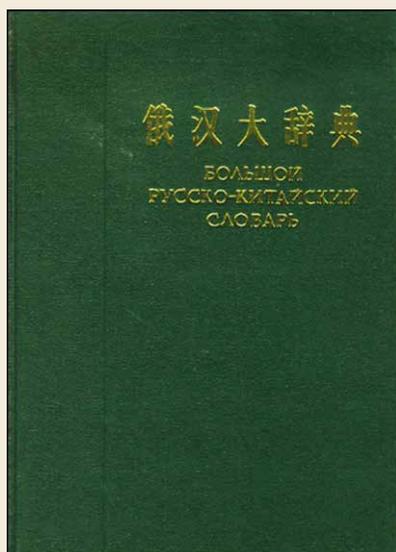
《汉语大词典》，共 13 卷。1975 年中外语文词典十年 160 种出版规划将其列为重点辞书，陈翰伯时任《汉语大词典》工作委员会主任。图为 1994 年版。



《汉语大词典》，共 23 册。2011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



《俄汉大辞典》，1960年，商务印书馆。



《俄汉大辞典》，1997年，商务印书馆。

怀 念

一个人的左与右，我并不知道，  
救的人，一个以实际行动为我们  
才能得到人民的尊重，才能维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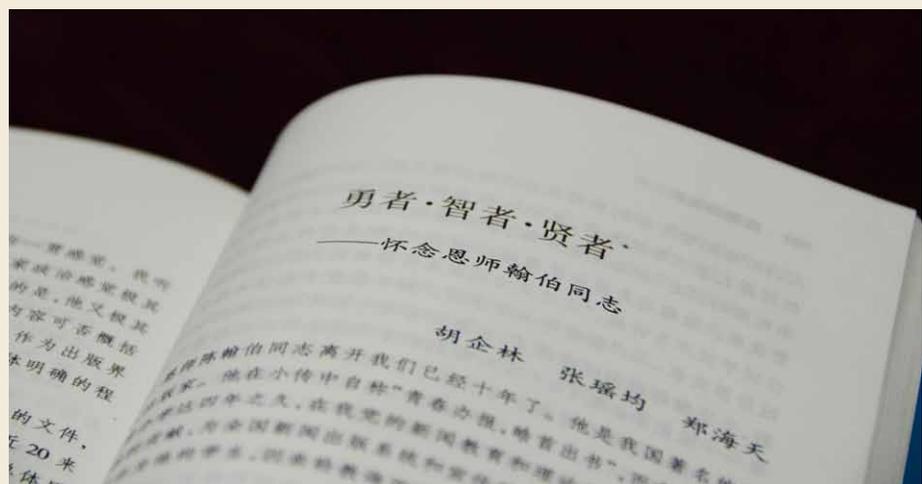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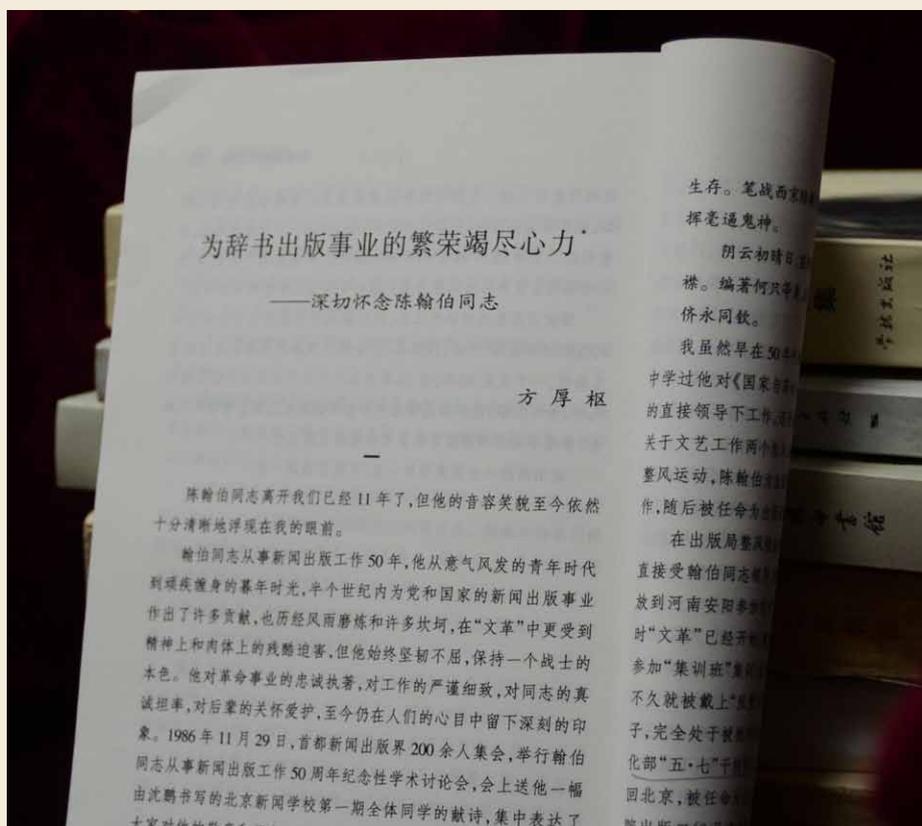
## 陈翰伯同志对出版领域解放思想 拨乱反正的重大贡献

宋木文

1996年初，在谈起《中国出版论丛》这套书时，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袁亮同志对我说，陈翰伯同志的出版文集大受青睐了。这引起我的注意，书一印出，我便找来阅读，果然如袁亮同志所说。

手捧《陈翰伯出版文集》，我想了许多。按从事出版工作的经历及其对出版工作的贡献，翰伯同志的出版文集理应在《中国出版论丛》这套书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应当肯定，现已出版的《陈翰伯出版文集》，对翰伯同志各个时期的贡献是有一定反映的，从一些文章中可以感受到翰伯同志的思想风格和，很值得敬佩和学习。大家都肯定，新时期我国书业取得了重大成就，翰伯同志是这项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在1974年、1975年期间，他积极支持陈群同志主持制订中外语文辞书十年规划，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后又全面推动辞书十年规划的实施，而对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汉语大辞典》、《辞源》（修订版）等辞书的编篡出版更是做出了重大贡献。

（原载《宋木文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



# 怀念翰伯同志

林尔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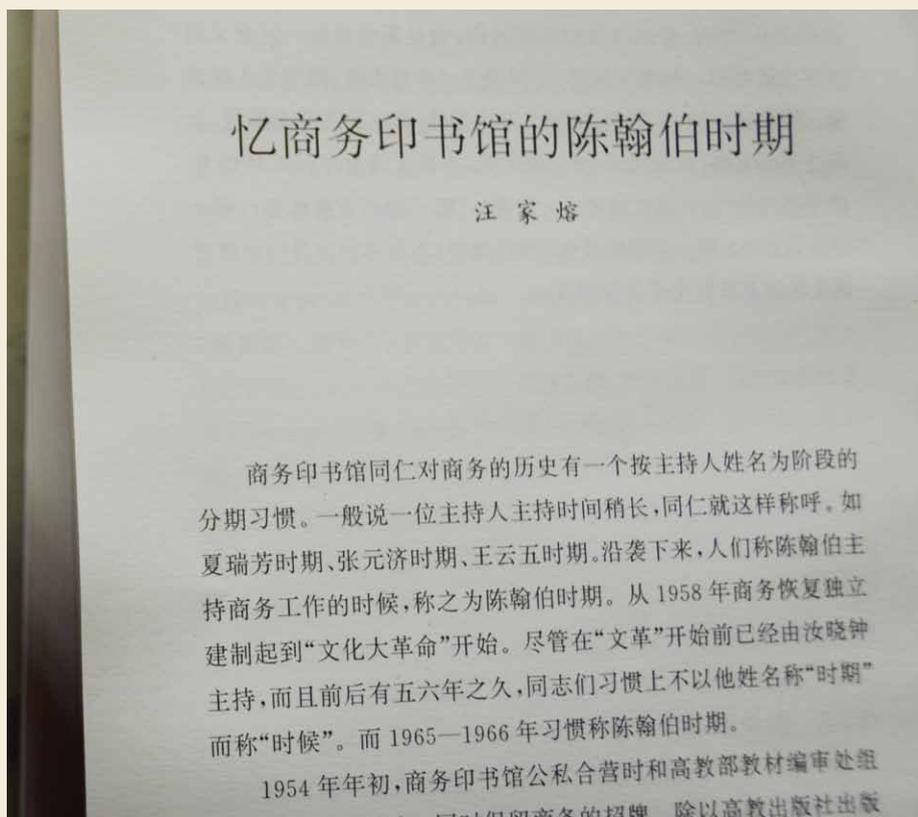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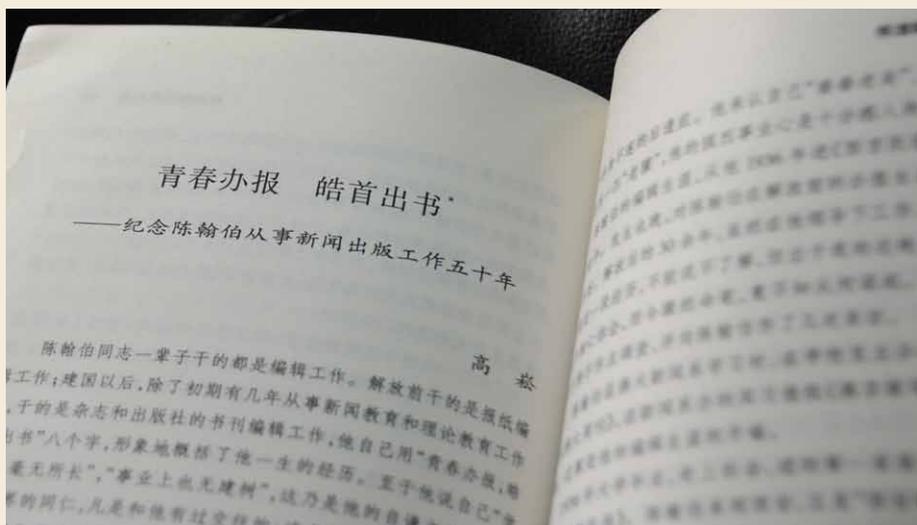
《陈翰伯文集》的出版,使我想起许多往事。

翰伯同志提倡实践,提倡自己写东西,搞翻译。他认为一个编辑、翻译、编辑,自己不写作,不翻译,是做不好本职工作的。他做商务后工作很忙,经常工作到深夜,但他从未放弃写作。当时我试着写文章,翰伯同志帮我从头至尾、逐字逐句地修改,并给我讲修改的道理。经过翰伯同志手把手的教导,我对以后的写作增加了信心。翰伯同志不仅帮助我修改文章,对许多青年编辑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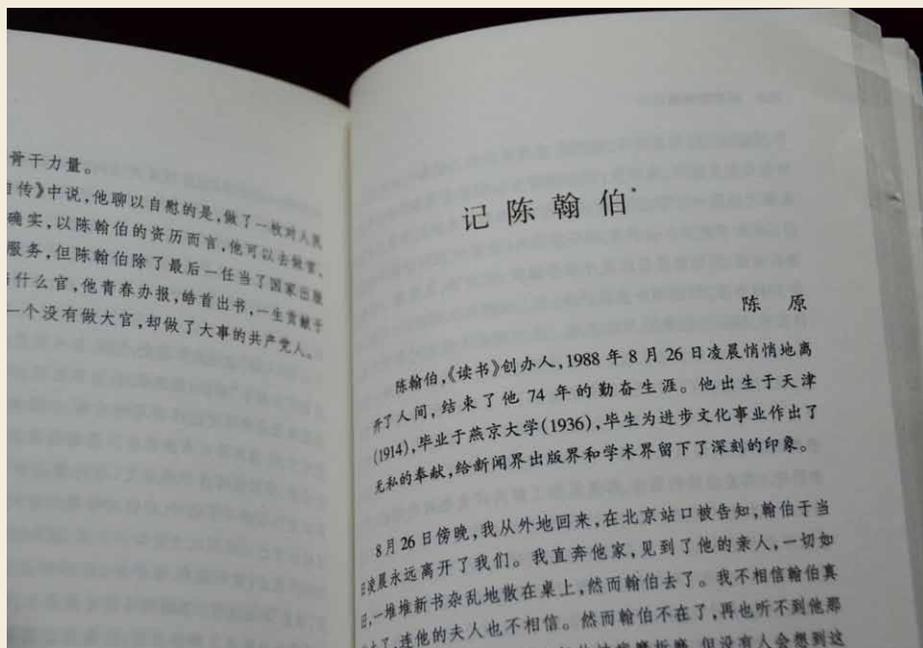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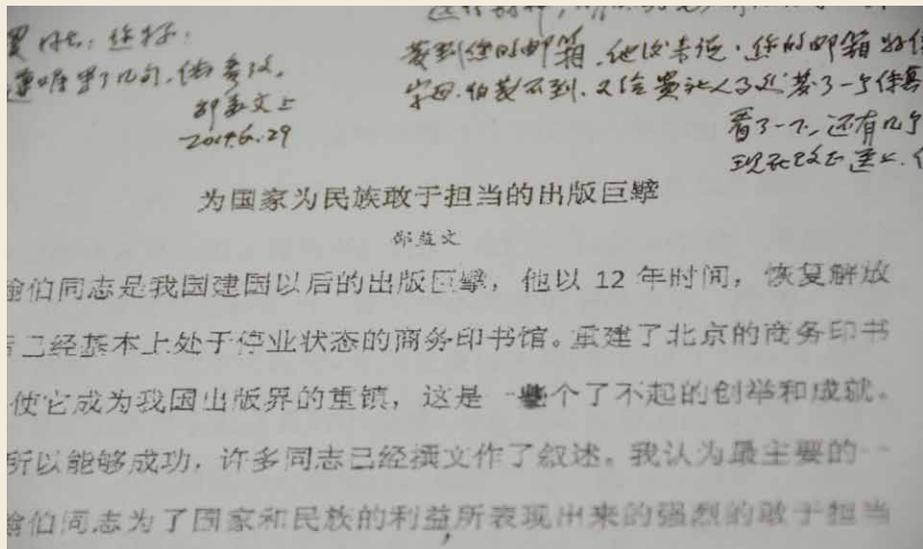
后,再逐个调到编辑室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既是出不了人才的。翰学术报告。这样,整个素质大有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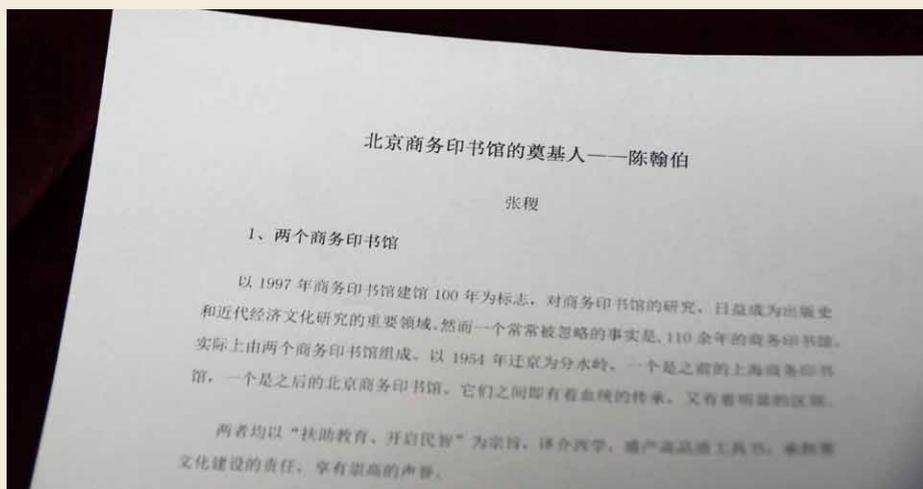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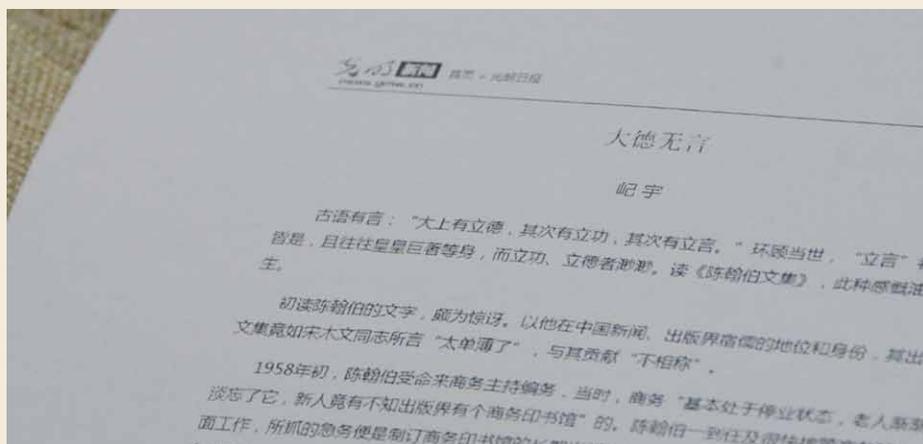
翰伯同志尊重并学“洋四史”;世界也鼓励别人学这“言组”见习,也开很尊重,很爱护。同志除安排好调入一些在旧社实行尊重知识、很高的编辑认类的任务有了文化大革命“文











“从小读者到老编辑”

# 从小读者到老编辑

陈翰伯

## 一 幼儿园的优等生

1921年，我7岁，从天津私立严氏蒙养园（今通称幼儿园）结业，老师给我发了奖：一盒彩色积木，10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世界》。这10本画报我当时还不会看，以后3年内，我慢慢地看，把书都翻烂了。其中有长篇漫画故事叫《熊夫人的幼儿园》，现在我还能记得它的内容。从此我就开始接触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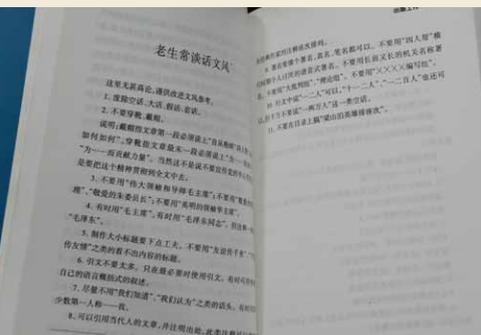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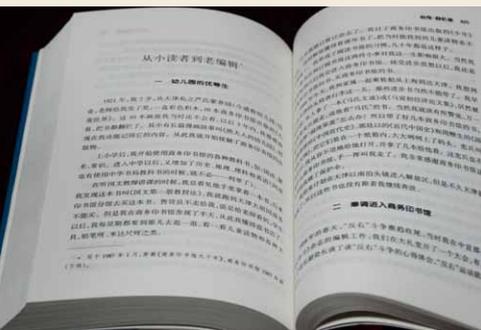
上小学后，我开始使用商务印书馆的各种教科书，如：国语、算术、常识。进入中学以后，又增加了历史、地理、理科和英语（间或也有使用中华书局教科书的时候，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在听国文教师讲课的时候，我总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本书，后来我发现这本书叫《国文第一册教授法》，我就跑到天津大胡同商务印书馆分馆去买这本书。售货员不卖给我，说是给老师看的，学生不能买。但是我在商务印书馆参观了半天，从此我懂得逛书店了。以后，我每星期都要到那儿去逛一逛，看一看儿童读物和各种文具，铅笔呀、米达尺呀之类。

10岁我就订报订杂志了。我订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少年》杂志。这时候也懂得看课外书了，把当时能找到的儿童读物差不多都看了。我养成了阅读书报的习惯，几十年都是这样子。

逛书店和订阅书报这两件小事对我这一生影响很大。当然我也没有料到以后我会进入商务印书馆。接受进步思想以后，我还是读商务印书馆的书，买商务印书馆的书。

1948年冬天，我和家属一起乘轮船从上海到达天津。我想到了在天津码头检查行李这一关。那些进步书当然不能带了。我早就听说，有人拿了一本《马氏文通》或《马寅初经济论文集》，居然被国民党宪兵捉走，说他看“马氏”的书。当然我就该有所警觉，万一碰上这种“超级笨蛋”怎么办？所以带了好几本商务印书馆的书，如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和周鲠生的《国际法大纲》，把它们装在一个纸箱内，大大咧咧上了码头。宪兵叫我打开，我从容不迫地给他打开，并拿了几本给他看。这宪兵也不懂什么商务印书馆，手一挥叫我走了。我非常感谢商务印书馆这些书给我做了保护伞。我原来计划在天津以南泊头镇进入解放区，但是不久天津就解放了，所以这些书也没有跟着我继续奔波。



陈翰伯文章三篇

## 二 奉调进入商务印书馆

1958年的春天，“反右”斗争渐趋收尾。当时我在中宣部主管《学习》杂志的编辑工作。我们在大礼堂开了一个大会，有几十个处长副处长谈了谈“反右”斗争的心得体会，“反右”运动就结束了。

当时，中央组织部准备抽调一大批人到高等院校去工作。中宣部点了四个人，我在其中。最初我到北京大学新闻系接谈过工作，后来又准备到天津南开大学去担任领导职务。

就在这个商量过程之中，包之静同志对我讲商务、中华两家要改组。他推荐我到商务印书馆去担任总编辑。我一向是做报纸工作的，没有做过出版工作，所以迟疑了一下。过些日子周扬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商务印书馆是搞“洋务”的，以后要翻译政治、学术书籍，你去管这个工作还挺合适。我就没再迟疑，表示同意去了。

我自知这方面我的底子还很差，马列主义基础也不行，怎么办呢？我想了个主意，读四史。这四史我指的是“洋”四史：世界通史、西方哲学史、经济学说史、政治思想史。我立刻啃起这几本书来了。我这么啃书，竟然带动编辑部的同志也都啃起来，对以后大家熟悉业务，倒是起了点作用。学问，学问，除了学，还要问，我同时又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几个有关系里向一些学者、专家请教，如贺麟、郑昕、洪谦、苗力田等同志。在此之前，三联书店已经编好一本若干年的出书规划，这个规划是用蓝纸印的，我们管他叫“蓝皮书”。我从这里入手，对这些书做了一些了解，当时，中华书局担任整理古籍的工作，在国务

院成立了一个中国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由齐燕铭同志挂帅。在商务，我们也打算成立一个外书翻译规划的领导小组，周扬同志曾让我去请沈雁冰同志担任这个工作，我就去拜访了当时的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他对我讲：“我是写小说的，弄弄文学还可以，这个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我不懂，我没法担任。”后来，周扬同志又让我找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潘梓年和张友渔，他们两人答应给我一些帮助，有些有关的会议让我参加，但是也没有把那个规划领导小组组织起来。我非常羡慕金灿然，中华书局搞成功了，我这里得到的支持较少，工作比较困难。后来我参加过文科教材会议，我在这个会议上又拜访了很多人，向他们求教，请他们提选题，出主意。在编辑部里，我抓了马清槐和陈兆福几位同志，把选目上列的书名，一一查出原文书名，想不到这样一件看起来简单的事，做起来，工作量也不小。做好这一步，我又组织编辑部高崧、骆静兰和胡企林几位同志从学科上对书目做一番遴选，把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一些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作为优先组译的书目，其中多以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有关的著作作为重点，就这样，我们自己的翻译出版规划，总算弄出来了，以后不断修订补充，几年之中都是根据这个规划进行工作。我们要介绍的这些书，主要都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学术著作，一般谓之古典著作，在60年代那个政治气候下，出这类书，还算可以，还有一些是近现代的资产阶级著作，印这些书，就不无风险。我们在两个方面做点“保险”工作，一是在译本前加上批判性序言，一是把好发行关，采取自办发行或由书店内部发行。商务的读者服务部，也就是这时办起来的。

商务印书馆还出版过一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先是中华书局出了

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由吴晗主编，很受读者欢迎。有一天吴晗见到周总理，向周总理汇报小丛书的工作。周总理对他说：你们还应该编一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出国人员渐渐多了，对外国的情况不大了解，读一点这种书多好。后来吴晗与我商量，要我们商务承担这个工作。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协助之下成立了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陆续出书。但到 1966 年一阵飞沙走石，出版这个小丛书变成“反革命活动”了。有两个人写了一篇文章，把我和吴晗、邓拓、廖沫沙一起划为“反革命分子”，罪过就是出版历史小丛书。

看来，老编辑做了他应当做的事，为商务印书馆尽了一点力，当年的小读者回报了他从商务印书馆受到的教育。

写于 1987 年 1 月



商务印书馆百年资源部 编印

2014年10月16日·北京

